

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D239

DH84/2/

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年·北京

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7印张 435千字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ISBN 7-80023-042-2/K·94

定价：5.90 元

编辑说明

《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一书，是1987年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部分研究人员和应邀的学者，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举办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讲习班讲课稿的基础上，修订汇编而成的。这些同志在讲课中，希图从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历史经验与当今改革开放的内在联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借鉴，并介绍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和学术动态。

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提出了努力方向和更高的要求。党史学的发展，也还有许多领域和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或重新认识。而我室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水平，同这些要求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为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与教学，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编印这本文集奉献给读者，以利于进行学术交流。文集中收入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乔木同志在讲习班上讲话的报道和胡绳同志在讲习班上的讲话，他们的意见对党史研究工作很有启发。王梦奎、李峻、王年一、孙怀阳、汪其来等同志在百忙中，冒着酷暑为讲习班上课，并提供了讲稿，特向他们表示感谢。文章中的论点，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期待着与同行们切磋探讨。

本书由王朝美、张琦、袁尉、董存发负责编辑校订工作。由于水平所限，恐有错漏，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87年12月

目 录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1)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胡 绳 (3)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	
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李 锐 (21)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戴鹿鸣 黄修荣 (47)
论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政治思想	
及其演变	汤应武 (70)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和关于中国社会	
性质的论战	汪其来 (99)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历史性转变及其	
对我们的启示	刘经宇 叶心瑜 韩泰华 (120)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条不同的	
指导路线	王 淇 王秀鑫 刘振起 (151)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必	
然性	王 沛 (183)
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沙健孙 (213)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	孙瑞莺 (244)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的	
经济体制改革	孙瑞莺 (270)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	周承恩 (292)
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王年一 (313)

红卫兵运动及其历史教训.....	苏采青 (34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王洪模 (381)
建国38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孙怀阳 (40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王梦奎 (423)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演变及评价	庞松 韩钢 (465)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李峻 (498)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研究

“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独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这番话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今天在看望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学员时说的。

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向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党史教育、党史征集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党的历史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因此，记录党的历史就应该从实际出发。党的历史上召开过很多重要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就按这些会议、决议和文件连贯解释下来，作为党的全部历史，因为党的实践不是党的决议、文件所能全部概括的，它经常要超出决议、文件的范围，如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党的各级干部的活动和对党竭力支持的社会人士的活动。同时，由于某些决议不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对形势的分析评价不符合客观实际，这些决议虽然通过了，但许多党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往往并没有照办。因此，对有关的复杂的情况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胡乔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长期内确有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但不能把党的整个历史仅仅看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记录。即使在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仍然是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党史对此应该如实、生动地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

众性的斗争都一笔抹煞。对我们党历史上的领导干部以至人民群众都应该有生动的形象的记录，在这一方面应该把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和发展。

胡乔木在讲话中还对抗战研究和宣传方面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

来自全国各地的650名党史研究、教学、宣传工作者在京将学习两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顾委常委李德生今天也一同到讲习班驻地看望学员。

（新华社记者张宿堂 人民日报记者毛磊）

（原载1987年8月2日《人民日报》）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胡 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要求。历史是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研究党史好象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要针对现实的。我们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当然不可以为了现实的需要改造历史。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是怎样就怎样。但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去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历史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觉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书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

党史研究也要注意社会效果。如果对某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在党史中没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在这些枝节上进行争论，只会对

* 本文根据胡绳同志1987年8月10日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定。

现实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宜粗不宜细，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党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材料里，拔不出来。我们应选择那些在历史上本来就重要，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对振奋人们斗争精神，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处的问题，抓紧进行研究。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在旧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个老问题。但老问题并不是不值得重新说清楚。过去我们讲党史，着重讲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虽然也涉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但主要是讲如何进行革命。必须革命是个不成问题的前提，所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上。但现在思想界和年轻人中有人提出，近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而要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要发展工业，振兴商业，发展教育，等等。有人甚至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就需要有能使经济发展起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农民战争造成扰乱、动荡，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固而不利于社会发展。提出这种看法，似乎忘记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迫使农民群众活不下去，因而才发生农民战争。按这个说法往下推论，就是说革命只起破坏作用，妨碍了社会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需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只要发展工商业，发展教育，旧中国就能变成新中国。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制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工商业、教育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怎么办？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进步与发展，才有可能使落后的中国近代化、现代

化。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如上的看法，那就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举出大量材料从各方面加以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时又指出，有些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不满，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们的心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们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同这种主张的论战进行了很长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作了一个结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中国富强。但是，富强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

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时要注意的一个基本方法。昨天的实际决定了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决定了今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是从昨天的实际变化而来的，但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经过在旧社会制度下长期的革命斗争，我国人民现在才有了安定团结的、独立自主的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局面。我们已经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正确的，但又是艰难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更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的局面，要继承前人的革命精神，完成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事业。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新的评

价。有人认为，我们很少理解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看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过：“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说，英国的侵略给印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宗法制度的社会组织由此而崩溃、瓦解。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它所遭到的灾难特别悲惨。马克思预言，亚洲一定要有一个“根本的革命”，而英国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如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所起的这种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家熟悉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还指出：“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同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因此而歌颂帝国主义侵略的“进步”意义。人们不能不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实行侵略扩张，奴役、洗劫以至消灭许多落后的部落、民族的事实；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内一方面摧毁其原有的宗法社会组织，一方面又为了便于实行统治而利用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不看到许多亚洲、非洲的民族和国家，虽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沾染上资本主义的

文明，但这种文明并不能造福于广大人民，而且只是在少数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地区中才可以看到这种文明，整个民族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确不自觉地充当了促成革命的工具，但它同时又是自觉地扼杀殖民地解放斗争的刽子手。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但侵略者又和中国封建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后者的支持者。这种侵略固然对摧毁中国固有的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作用，但是并不能为中国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只是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深渊。中国的新世界只能由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来建立。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如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某种“进步”的作用，那么侵略得越多越好，甚至中国要不是变成半殖民地，而变成殖民地，中国就能更早更多地摆脱封建旧制度的羁绊，那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假想。仅就经济来说，大家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起了促进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自然经济并没有完全解体，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到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旧中国的商品经济没有能充分发展起来呢？这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名爱国人士，在看到殖民地的状况时触目惊心，不能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1898年曾游历夏威夷群岛。他说，1788年英国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30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时，当地土民有20余万人，但到1890年成了34436人，到梁启超去的前二年1896年成了31019人。他从统计表中看到，大约每六年又减去十分之一，因此惊叹到“依此比例，则百

年以后，全岛中则无复一土人矣”。梁启超感慨地说，“自古之亡国，只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夷，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岂不傲惧耶。”他也说道，这个岛上近几年来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当地人自以为得意，但岂不知绝种的危险即在眼前。梁启超并不是主张革命的人，但他在当时绝不是个守旧派。他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不能不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大声疾呼。

到了1934年，又有一个爱国者邹韬奋也经过夏威夷。他说，现在共有人口38万余人，但“这群岛原来的主公（即夏威夷土人）却占极少数，只有22230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1896年的31000余人，又减到2万余人。韬奋根据两个美国人的著作说，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这种病是宣扬“文明”的西方人带去的。韬奋说“土人不胜梅毒和残酷榨取的蹂躏”。所以在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间近于灭绝。这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

这些爱国的先驱者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出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也许有人说，把几万万中国人“灭种”，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大可能。但帝国主义象日本侵略时那样统治中国，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从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隶，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明和进步！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大国，人民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不断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虽打算“瓜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近代中国没有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国被瓜分为一块块由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会比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要艰难百倍，这是显而易见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觉地充当了造

成革命的工具,就因为它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使许多落后民族在濒于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在这些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的地狱的强烈对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产生多种形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产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当然,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斗争,并且达到胜利,还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

有些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学者,竭力申述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的作用,但他们无法否认,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中国不需要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争得独立自由,才能有进步与发展。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看来,中国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这的确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必须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才能帮助许多不了解旧中国情况的年轻人认识清楚。

党的历史的发展是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讲党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讲。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至于怎样进行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领导,是主要靠武装斗争还是靠合法斗争形式。是先从农村还是先从城市开始,这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党史如果脱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就没有基础,就得不到科学的解释。

二、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

我们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史应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天生的,好象党一产生就立刻得到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形成,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党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能起到领导作用，首先是由于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各个时期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党的主张真正为群众所接受，把群众的水平逐步提高，是经过艰苦努力的。比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党领导进行的，的确把全国广大的群众卷了进来，但也要看到，那时参加爱国运动的人有不同的水平，有些认识甚至相差很远。所以不能把党的领导形成说得那样简单，以为党一发出什么号召，立刻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全国人民都拥护。1927年我们失败得很惨，能说那时全国都拥护共产党吗？不是这样。国民党还很有欺骗性，全国还有很多地方革命影响没有触及到，许多群众对革命恐惧、淡漠，中产阶级更是疑虑重重。八一南昌起义也不可能是全国很多人都了解，都赞成。

30年代，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使党与群众建立起最广泛、最深入的联系。最近，在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的时候，国外有人议论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承认一二九学生运动和那时的救亡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但似乎有些夸大了自己的领导作用。我认为，那时的学生运动、救亡运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并不是只是因为共产党发动才发生。共产党最坚决地主张团结抗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所以的确是党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运动不可能那样地发展壮大，坚持进行，并且斗争水平逐步提高。但我们也从不认为，参加学生运动、救亡运动的所有人都明确承认党的领导，所有主张都同党一样的水平。如果那样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不正确的。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狭隘的报复主义，排外主义，民族自卑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对共产党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党提

出符合各阶级人民的要求的主张，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但要真正形成领导，使斗争坚持到底，必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一下接受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那共产党还要做什么工作？整个抗日战争中，党不断做工作，克服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障碍，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斗争水平，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党的领导的确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说清这个问题对现实也有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为充分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也还要做许多努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时，党是靠做许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一步步说服群众，还靠许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逐步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威望，实现党的领导。我们今天也还是要这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要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党在民主革命中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党史中讲反对“左”倾，往往主要讲反对“城市中心论”。相对来说，比较少，讲到统一战线。照毛泽东的说法，统一战线中心就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两条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还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后来叫做三大法宝。这的确是贯穿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放松了武装斗争，没有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的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果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搞武装斗争，但是忽略了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遵义会